

革命、改革和地位传承： 1949—1996 年的中国城市（上）

[美] 魏昂德 胡松华 著 张 霞 那丽芳 译

本文为斯坦福大学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魏昂德（Andrew G. Walder）与就职于麦肯锡公司的胡松华合写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2009 年第 114 卷第 5 期。两位作者认为，中国政治发展轨迹与其他共产党政权国家在两个方面很不同。一方面，在中国建国的头 30 年里，对精英地位传承在政策上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另一方面，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在后来的市场经济转型中，中国共产党保存了下来。代际研究数据显示：尽管在毛泽东时代被排斥出政党和行政职位，某些新革命精英仍然以惊人的程度将某类精英职位传给了他们的后代。同时，遭受毛泽东时代激进政策打击，后来迅速得到平反的革命前的旧精英，其后代也以更高的比例继承了他们的精英身份。文章内容如下。

如今，吸引我们的有关转型经济国家的各种问题与半个多世纪前关于相同国家的那些问题是非常类似的。当我们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的退出这一现象时，我们要解释很多旧得多的问题：革命对阶级结构和机会平等真正产生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无论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急剧更新，先前的精英是否都设法获得了成功？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化是否并没有使新的精英获得多少机会来提升和巩固其地位？革命和改革带来了什

么样的真实的长远影响？无论其分支学科是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还是政治社会学，这些都是本学科的基本问题。

今天有关转型经济国家的研究几乎全部都集中于关注代际间的变化进程，例如市场扩张、私有化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变革对建立在职业、政治关系（过去的或现在的）、教育水平和其他相关因素基础上的个人收入或职业流动性的影响。相关研究成果是丰富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当多的争议，虽然大部分争论主要关注的是市场机制对个人或家庭收入的影响。^①而研究随着时间发生的职业类型和工作班次的变化以及政治从属关系和教育对个人职业的影响的文献，探究了那些争议少得多的相关问题。

只是到最近，各种著作才开始研究这些变化的代际影响。导致这种延迟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要去评估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对下一代的影响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而要对仅仅在一代人之前才垮台的政权做出确定性的陈述还为时过早。当然，能够获得跨代调查数据使得我们有可能开始探究这一问题以及另一个与此相关的被长期忽视的议题——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地位传承的程度，这为当前时代发生的变化能够得到评估提供了仅有的起点。代际流动性长期被视为衡量社会和政治变化（例如现代化和革

命) 的长远影响的关键指标。社会出身对个人生存发展机会的净影响 (net impact) 是衡量一个社会中机会平等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地位间的界线在何种程度上得以明确以及可识别的精英在何种程度上和通过哪种机制巩固其地位的重要尺度。

虽然所有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权都有着相同的建立在“再分配”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基础上的经济模式,同时它们的执政党拥有相同的体制,但是它们在内部政治中还是展现出惊人的不同之处。在许多国家内部,在社会主义时期出现了政策上的急剧变化。在不同的政权之间,同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明显的政策差异,甚至在最近这些年,后共产主义政权与正在进行改革的共产主义政权之间出现了更加广泛的政治差异。这种政治变化,或者“政权变动”(regime dynamics) 对个人的生存发展机会有着直接影响。特别是中国,它所遵循的政治发展轨迹长期以来都不同于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中国曾公开批评其他社会主义政权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过于保守。从 1949 年一直到 1978 年,中国的政权遵循了截然不同的政策,旨在剥夺革命前的精英和革命后的精英将较高的地位传承给后代的能力,但是这些政策后来被彻底放弃了。1978 年之后,随着其实施了市场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发展轨迹继续遵循着截然不同的路径: 尽管没有进行政治自由化,但中国共产党存活了下来并且得到发展壮大,这与那些垮台并建立了后共产主义体制的政权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论其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前还是之后,中国政权的特点都使得我们可以预期其地位传承的模式是不同的。在毛泽东时代,对地位传承所设置的制度障碍是超乎寻常的强大,而毛泽东之后的政治自由化和党的继续执政使得我们至少期待看到党的精英之间所延续下来的地位传承,这种传承更有可能是增加了而不是相反。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新中国政权制定了一些政策,旨在惩戒那些来自革命前的

精英家庭的成员,例如不让其入党和占据拥有职权与特权的位置。它也制定了一些政策,旨在区分和优待那些出身于政治上可靠的家庭的人,尤其是那些在革命胜利之前就入党和参军的人。类似的政策在前苏联历史的早期和苏联阵营的新政权中曾经实施过,但是这些政策要么被随意地实施,要么被早早地放弃。另外,1966 年到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制定了针对新政治精英的严厉政策,力图阻止这些新的精英把他们的地位传给他们的后代。在苏联的历史上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关于中国代际地位传承的新近变化的研究总是受到如下事实的困扰,即我们依旧没有衡量出早期的政策对精英家庭所产生的实际的净影响,因此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标准去衡量其变化。

一项全国性的跨代生活历程 (life-course) 的样本调查使得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次成为可能。本文探究了 1949 年后将近半个世纪的地位传承的情况,既关注革命前的精英,也关注革命后的精英。本文尤其感兴趣的是以下政策的影响: 毛泽东时代较严厉的政策和随后的市场改革中较放松的政策。这些歧视性政策对旧精英后代有什么影响,这些后代能够克服这些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政治障碍吗? 革命后的新精英的后代在何种程度上享受了超过其教育水平所能保证的职业上的优势,尽管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也遇到了挑战? 这些优势在毛泽东之后的市场转型时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流动性研究中的两个传统

流动性研究中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关注了我们提出的广泛问题。第一种传统把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当作有关代际流动性跨国比较研究中有趣的次级样本。这种传统源自对于经济现代化对社会阶级结构、社会开放程度和社会流动性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探究。其目标是测算出代际流动性的总比率的

差异，以便把握整个社会的流动性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研究探究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新陈代谢，以便衡量不平等是在何种程度上进行代际复制的。更高的流动比率意味着更开放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中，职业目标（occupational destination）更少受到社会背景的制约；更低的流动比率意味着更加封闭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中，机会更少被公平分配。这一方向的研究可以使用职业声望的级别这一努力获得跨国有效性的指标，或者使用针对流动性表格的汇总定序分析，这种分析可以估算出个人的职业地位高于或低于他们父母的整体程度。这一传统的关键点是区分出经济发展导致的结构流动性与意味着更大的社会开放度的循环流动性，以便确定正式教育在何种程度上成为职业升迁的关键因素。当应用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情况时，这一传统试图论证如下观点，即共产主义政权建立起与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相适应的更高层次的机会平等。

第二种传统更加集中关注的是精英的构成和这些政权所特有的流动性的政治维度，特别是党员身份在职位升迁中的作用以及导致不同的精英地位的各种出身背景，不论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还是后来的市场经济转型期。比起那些激发了有关代际流动性比较研究的问题来，这些问题更多是由政治社会学中的议题所引发的，并最终被有关精英内聚力、政权稳定性和政治变化的问题所促动。这一传统源自很早以前就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关注的是新的“统治阶级”是否逐渐主导着作为俄国革命遗产的一党专政，尤其是在斯大林主政之后。

对于拥有调查数据的当代社会学家而言，这些问题被转化为有关共产主义政权中流动性的政治维度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没有实行一党专政体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中不存在直接相对应的问题，并且在另一种传统中是被忽视的。党员身份和教育水平在职位晋升中发挥了什么样的相对作用，这种作用会

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吗？这些出身背景在涉及不同级别的政治和管理权力的职业发展道路上所具有的分量是不同的吗？党员身份和精英地位是面向不同出身背景的成员公开竞争，还是说这些精英地位是跨代传承的？这一传统为了更加集中地关注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顶点的人（以及政治对流动性的影响），忽视了更加广泛的关于社会流动性和流动性的总比率的问题。^②

我们的研究是牢固建立在第二种传统的基础上的，我们更进一步将这一传统扩展到了有关地位传承的问题上，我们不仅要研究革命后党内精英的优势，还要研究革命前的精英的后代在毛泽东时代及其之后的命运。

中国：政治上的自由化和制度的延续

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没有经历其他转型国家那样更加明显的政权变更，但它经历了不明显却引人注目的政治变化。要想充分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始前那段时期的政治，特别是 1966 年后与文化大革命相关联的 10 年。这一时期见证了对当时在职干部的史无前例的打击，实施了旨在阻止他们的家庭巩固其精英地位并将其利益传承给后代的政策。从 1966 年到 1972 年大学没有录取任何阶级出身的人，1972 年到 1978 年也只剩一小部分人可以通过党政干部的政治推荐去上大学。从 1968 年到 1972 年的大部分时期，政府干部和专家都被大量地发配到农村地区或工厂中参加劳动，直到 1973 年他们才开始大规模地返回到他们最初的工作岗位。^③在 1966 年后的 10 年，正常的人事测评和职位晋升中断了，从 1963 年至 1978 年也没有增长工资。“上山下乡”政策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分析，根据这一政策，几乎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被无限期地派往农村。这一做法开始于 1968 年并持续了 10 年，在此期间，有 1800 万青年人被发配到农村。直到 20 世纪 70 年

代末，这些青年人中的大部分才回到城市，继续其被中断的学业和事业。这些激进的政策为精英把地位传递给下一代设置了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正常的教育和职位晋升被中断了。

除此之外，这些激进的变化加强了从 1949 年开始实施、直到 1978 年才结束的那种阶级划分政策。这种阶级划分在教育进修和工作分配时得到强调突出，旨在表现出对革命家庭和先前被剥削阶级家庭的偏爱，以及对早期有产阶级家庭成员和政治上的守旧精英的歧视。这些毛泽东时期的激进政策加深了对来自“反革命”家庭的、拥有不良阶级背景的人员的歧视。然而这种政策对先前革命的“红色”家庭的影响是含糊不清的，因为许多出身于这种家庭的人在过渡时期成为了干部，在“文革”中却作为“修正分子”成为首当其冲的斗争目标，在那些年，他们失势后被剥夺了权力。

在毛泽东仅仅去世两年后的 1978 年，这些政策被否定并停止实施。源自阶级划分的歧视被消除，大学得到重建，高考被恢复，将城市青年送往农村的做法被终止，被不公正对待的政府干部得到平反和恢复职位（如果他们幸存下来的话，“文革”前的工资待遇与人事管理得以恢复。这些是重大的政治变化，对于职位的流动性和地位传承而言具有显而易见的意义，即使它们并不预示着后来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看到的那种政权变化。尽管我们知道这些早期的严厉政策得到了实施，但是我们依然对其真实的影响所知甚少。

先赋性阶级划分与家庭政治地位

毛泽东时期的政权干预地位传承的主要机制是家庭成分划分。1949 年共产党巩固政权后，所有的城市和农村人口根据政治上所定义的阶级成分进行了划分。这种划分机制建立在所在地区解放时家庭成员的职业、收入来源和政治忠诚度的基础上。这种阶级划

分成分被指派给以男性户主的名头为基础的整个家庭，其后代按照男性这一序列进行继承。尽管阶级分类很详细，但它们可以归为三个大类相。绝大多数人口被归为“红五类”，他们被偏向于认为在本质上是忠诚于党及其政策的。显然，这一群体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那些被认为在革命前的社会秩序中属于被“剥削”的阶级。产业工人、贫穷的城市居民、没有土地的穷人和“中下农”构成了中国 1949 年以前的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他们都被归类为“红色无产阶级”。被归入这一受到优待的红色类别的还包括了主要男性成员在革命胜利前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那些家庭，他们中的许多人在 1949 年之后都被委任了领导职位，以作为对其积极奉献的奖励。“红五类”家庭涵括了大约 82% 的城市人口，其中只有 4.4% 的家庭属于人数更少的“革命家庭”（见表 1）。

表 1 家庭的社会特征（按照阶级成分排列）

阶级标签	父母的教育(年)	父母的党员身份(%)	1949 年前的财产权(%)	祖父 1948 年的高身份职业(%)	分类比例(%)
红色: 革命	9.4	71.1	11.9	27.3	4.4
无产阶级	4.2	15.4	4.3	13.5	77.9
中间	5.5	10.5	18.3	67.3	14.3
黑色	6.8	2.9	59.2	82.5	3.4
全部	4.7	16.8	5.7	23.5	100

来源：在 1996 年收集的回顾性调查数据（Treiman, 1998）。

注释：父母的教育是指父母中的一方所受过的最高水平的教育；父母的党员身份是指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加入共产党的家庭所占的百分比；1949 年之前的财产权是根据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来定义的：1949 年以前祖父辈或者父辈是否拥有住房之外的房产，是否雇用家庭成员之外的其他劳动力，是否收租，或者 1949 年以前是否拥有大企业；高身份职业定义为“中农”，“小商人”，“富农或地主”，“小店主、房东或企业家”，“私塾先生或教师”以及“医生、中医和兽医”。

在政治光谱上，与受优待的“红五类”家庭相对立的是“黑五类”家庭，他们因为反动的政治立场而受到谴责。与“红五类”群体类似，“黑五类”的界定所依据的是经济地位和政治忠诚度。根据其财产权所有权界定的剥削阶级（包括资本家、地主、富农）

被归到这一类。具体原则是他们雇用了劳动力并从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榨取了剩余价值,因此他们被视为在本质上是与共产党的纲领相敌对的。属于黑色一类的当然也包括那些加入国民党或曾经在国民党政府或军队服役的人员。这两个群体的人数非常少,占城市人口的3.4%。

第三类模糊地处于这两种极端类别之间,这一中间类别被认为在本质上既不是忠于党的,也不是反动派。作为马克思主义术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被判定为在本质上是机会主义者:当革命力量处于优势时,他们就支持革命力量;当反动势力强大时,他们就忠诚于反动势力。该群体分类包括城市和中产阶级的中产阶层:白领工人、专业人士、小商贩和小店主、自给自足的“中农”。在革命前,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拥有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收入和财产。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中对他人的剥削,因此他们并没有被认为在本质上是反动的,因而没有被指责为“黑五类”。这一群体的总数是“黑五类”的四倍多,含括14.3%的城市人口。1949年后,这类人员从本质上没有被定义为不忠和反动,也没有受到各种各样的最严重的歧视。然而他们也不像“红五类”成员那样受到照顾。

虽然这些分类都是基于(男性)家长地位的先赋性印记,但事实上它们代表着两种基本涵义上的政治地位。首先,这种分类本身意味着站在政权的立场对家庭本质上的忠诚度所作出的政治判断。这些家庭的后代仍然会贴上这样的阶级划分的标签,而无视他们实际的政治忠诚度和政治行为,党的相关部门在对其进行政治评价时会涉及这些标签有利的一面或不利的一面,而这些评价伴随着入学、工作分配、晋升和入党本身。其次,这种分类体系的政治维度要优于建立在社会阶级基础上的称呼。地主、富农或资本家家庭的成员只要其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有很多这样的人),就会

被划分为革命的红色阶级,即使他们的父辈的家庭应该被归入反动派。同样地,在国民党内担任过某个职位的贫苦农民和工人会被划分为反动的“黑五类”,尽管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他们来自受剥削的家庭。

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才能获得关于这些类别的家庭的真实社会特征的数据。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革命“红五类”具有先前的黑色剥削阶级和政治反动派的许多社会特征。在革命阶级中,其父母的教育水平是无产阶级的父母的平均水平的两倍还高,甚至显著高于“黑五类”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水平。显然,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教育水平低的农村革命者起着先锋带头作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出现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来自中产阶级和旧精英家庭的革命者几乎都被归类为革命阶级。有关调查对象的祖父母辈在革命前的财产所有权情况和职业地位的数据表明,革命家庭的财产远没有低于以前的中产阶级家庭(比无产阶级家庭的两倍还多),他们的祖父母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拥有地位相对较高的职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党的阶级路线所造成的偏向,这些家庭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在革命后发展的很好。(未完待续) ■

注 释

- ① 与之相关的争论主要是早期共产党政权中党员成员能够获得持续收益优势的根本原因。2002年戈伯认为,在俄国这种优势主要归因于未被关注的个人特点,这种个人特点在制度保障下发挥得更好,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关于市场转型和收入不公平的强有力的争论。
- ② 这种研究传统的分支是赛伦伊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匈牙利农村私人企业家的家庭起源的分析研究,尽管这一研究主要涉及新产生的农村精英,这种精英直到市场改革最早阶段才出现。
- ③ 在这段时期,相当于或超过一个城镇人口的120万的党政干部发配到农村,使得无法完成大量的体力劳动任务。

[张霞: 云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那丽芳: 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

(责任编辑 周守吾)